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3.016

我国总需求结构持续失衡的空间经济学解释^①

——来自城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李辉文^{1,2}, 左翔¹, 欧定余²

(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 上海 201620; 2. 湘潭大学 商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 其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越高, 而城市投资率越低。按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子样本回归, 发现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对降低投资率的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是显著的, 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这一结果在控制一系列变量和城市固定效应之后依然高度显著。这意味着从推动宏观经济层面总需求结构的合理调整出发, 有必要改革现行控制城市规模人口的政策取向, 尤其应当放松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限制, 以促进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平衡、协调、可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关键词: 城市化; 城市规模; 投资率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5)03-0092-07

A Spatial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Sustained Imbalance of Aggregate Demand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City – level Panel Data

LI Hui-wen^{1,2}, ZUO Xiang¹ & OU Ding-yu²

(1. School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anghai 201620,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rger scale of urban popu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lower rate of city investment. Using sub – sample regressions in the east, the central and the west regions, we find that the expansion of urban population reduces investment rate in the east and the central regions significantly, while it does insignificantly in the west. These results are still highly significant after controlling a series of variables and urban fixed effects, which means that consid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the rational adjustment of aggregate demand structure in macroeconomic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current policy orientation of controlling urban population scale, especially to relax the restriction of the increases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in the east and the central regions, in order to accelerate a sustainable, sound and speed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under the “new normal”.

Key words: urbanization; city size; investment rate

① 收稿日期: 2015-01-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08BJL013); 湖南省教育厅基地开放重点项目(10K060); 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06ZC61); 上海市高校085工程项目(x085132441-3、Z085-14105、Z085YYJJ13004、Z085YYJJ13041、ZK-14013); 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专项项目(JWXX-14001)

作者简介: 李辉文(1977-), 男, 湖南长沙人, 博士,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 湘潭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 主要从事空间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相互交织的经济结构多重失衡,并因此引发了诸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和经济增长质量的讨论,其中宏观层面以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为主要特征的总需求结构失衡尤其引人关注。这不仅因为高投资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还因为它和经济结构的其他方面比如消费低迷、持续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乃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成为深入理解中国经济多重结构失衡的一个关键因素^[1]。

和现有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空间经济学或者说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强调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规模分布的分散化对于高投资率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这一过程中因为经济活动的快速集聚而带来的报酬递增,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内生增长,因此而产生的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巨额需求又不可避免地推高了投资率^[2]。就此而论,在快速转型的经济体中,持续出现较高的投资率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但我国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从空间上看,城市规模分布一直相对分散。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这种持续分散化的城市体系成为高投资率的一个重要根源。城市化之所以产生并且为经济集聚和内生增长持续带来动力,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具有规模经济。城市规模越大,为吸纳新增人口所需的边际上的人均基础设施投资就越少。而中国式层层下放的“财政联邦制”或者“行政发包制”,导致了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一方面激励各级政府竞相发展本地经济,因此推动了各地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经济活动的集聚遇到了行政边界的制约。此外,政策制定者又一直支持促进城市规模均匀分布为目标的政策。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了城市规模分布的分散化。这种相对分散的城市规模分布,意味着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经济得不到充分发挥。考虑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中国的投资总额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过于分散的城市规模分布一定对应着更高的投资率。

本文采用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对城市规模与城市投资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对城市投资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城市常住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其投资率越低。这一结论在控制城市固定效应之后仍然显著。这意味着更加集中的城市规模分布将在维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同时,有效地缓解困扰中国宏观经济多年的投资率居高不下的难题。

1 文献回顾

本文的研究与两支文献直接相关。其中一支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低消费和高投资的成因加以解释,另外一支则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中关于城市规模和规模分布经济效果的研究。

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的相关研究又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侧重于总收入这一侧的分析,对高投资的另一面——低消费或者说高储蓄问题的成因进行讨论。这些研究对低消费或者说高储蓄的成因的探讨涉及到如下几个方面:人口结构当中劳动人口比率上升和预期寿命延长推高居民储蓄率^{[3][4]},金融市场不发达所引起的流动性约束刺激储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5],文化、习惯和家庭偏好等主观因素抑制消费^{[6][7]},保险市场的不健全引起高预防性储蓄^{[8][9][10][11][12]},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拉低消费率^{[13][14]},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引起居民储蓄率上升。另外,陈斌开等特别强调转型期的要素市场垄断和产品市场垄断对于提高居民储蓄率具有重要影响,而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则导致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滑,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费。Chen、Lu和Zhong^[15]也认为,户籍制度通过阻碍人口集聚而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

但上述研究实际上只是解释了消费低迷,而并不能完全解释持续的“低消费-高投资”。从理论上说,低迷的消费可能引起严重的衰退,而衰退又与投资低迷相伴。实际上凯恩斯就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作为解释总需求不足的三大心理规律之一。而中国的现实恰恰与此相反,在消费低迷的同时,强有力的投资需求弥补了消费需求的不足,并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那么这种巨额的高投资需求究竟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在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长期不振的条件下,作为派生需求的投资需求却可以持续居高不下呢?对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一些文献对高投资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其中一些研究强调宏观价格环境的影响,认为资源和资本使用价格长期低于均衡价格刺激了企业的过量投资^{[16][17]}。另一些研究讨论了地方政府行为与高投资之间的关系。其侧重点是独特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和激励机制^{[18][19]},导致各地都会倾向于采取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其中一些研究还特别强调了地方政府对资本密集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偏向。其中的机制,既包括财政支出结构上的“重基建轻民生”^{[20][21]},又包括地方政府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采取的政策导致投资的过度资本深化,即为了在既定的可用工商业用地上创造出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有激励采取偏向规模更大、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企业和项目的政策,从而引起资本的过度深化和投资率偏高^{[22] 29-67[23] 71-123[14]}。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于高投资成因的理解。但面临同样的财政分权体制约束,为什么不同城市的投资率和其他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会产生显著的差异?此外,按照这种解释,那么土地的相对稀缺程度越高的城市,政府应当就越是激励鼓励节约土地的投资项目,从而其投资率也就应当越高,而事实上东部地区的投资率却比西部地区更低而不是更高。陆铭等用90年代末开始的大规模区域间平衡政策导致中西部地区投资的资本密集度过高来解释。但区域内的投资率差异仍然有待解释。

一个常常被宏观经济学家忽略的视角是投资率在空间上的差异。一个国家宏观上或者说总量上的投资,从空间上看都是由不同城市的投资加总而来的,而不同规模城市的投资率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一些研究认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高投资具有必然性,因为快速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24][25]439-469}。李扬和殷剑锋也认为,中国发生于二元经济中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增长路径当中,高投资率是与长期劳动力转移过程互为因果的必然现象^[26]。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讨论城市规模分布对于投资率的影响,也没有涉及不同城市之间的投资率差异问题。

城市经济学家对城市规模分布及其经济绩效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发现城市规模服从幂律分布^[27]。而中国,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水平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比较,不仅城市化进程滞后,城市规模分布也偏于分散,尤其缺少人口在100~1200万的大中城市^{[25] 439-469}。有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规模的基尼系数远低于世界上的很多较大的国家,而只与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较为接近^[28]。张涛和李波也发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规模之间的差异偏小。

过于分散的工业化和过于均匀的城市规模分布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后果^[29]。有研究指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曾经出于追求区域平衡发展的目的,强行推行经济板块均等化战略,这种工业经济的分散化和扭曲的价格体制、高昂的军备支出共同导致了苏联的衰退,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城市规模分散化对于环境、就业等重要变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30]。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将城市规模的空间分布与宏观经济层面的消费-投资失衡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最近雷潇雨和龚六堂^[31]发现,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其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GDP的份额就越高。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本文的结论。但如前所述,仅仅考察低消费并不能得到宏观经济失衡的完整解释。不仅如此,而且考虑到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巨大的人口流动和随之而来的跨越城乡和城市的消费活动,以市辖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作为市辖区消费额的测度指标,可能存在较大的测量误差。而投资行为数据则不会出现类似问题。因此,本文以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城市投资规模的测度,从投资这一侧入手进行实证研究,测量误差和相应的偏误应当更小。

2 数据和计量模型设定

2.1 计量经济模型与变量选取

$$\text{invest_rate}_{it} = \beta_0 + \beta_1 * \text{city_size}_{it} + X \cdot \gamma + \delta_t \cdot \text{year}_t + u$$

其中被解释变量 invest_rate 为城市投资率,以各地级市市辖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并乘以100所得到的百分数来测度;关注的解释变量 city_size 为城市人口规模,以市辖区户籍人口数的对数值衡量; X 是控制变量向量; year 是年份虚拟变量。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

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衡量城市产业结构的三个指标:第一产业在GDP中的占比,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相对结构,以及民营经济比重。此外,回归中还包含了城市人口中普通高校教师占比,以此控制

城市人力资本存量。由于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深度参与和对当地投资活动的重要影响,回归中控制了本市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程度的代理变量。考虑到对外开放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回归方程中也控制了城市开放度。开放度以全市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率作为测度指标。此外,为了从侧面确认城市具有改善固定资产利用效率的规模效应,本文还以城市单位 GDP 平均的道路面积和排水管道长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辅助回归,以检验这一猜想。主要变量符号、名称与取值方法如表 1。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与取值方法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取值方法
ci2y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率	市辖区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当年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并乘以 100
lchk	城市户籍人口规模	市辖区户籍人口数的对数值
estructure1	城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市辖区第一产业占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estructure2	城市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增加值比率	市辖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率
cown_strctr	城市所有制结构	市辖区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与市辖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的比率
cunivers_r	城市普通高校教师占比	市辖区每万人中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
tfiscal_r	城市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全市财政支出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copns	城市开放度	全市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率
lroad2y	城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平均的道路面积	市辖区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平均的道路面积的对数值
lwtp2y	城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平均的排水管道长度	市辖区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平均的排水管道长度的对数值

2.2 数据来源和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是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考虑到中国经济在加入 WTO 前后可能发生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可能涉及到难以观测的变量,为了减少因此引起的内生性偏误,我们采用 2003 ~ 2011 年的数据。表 2 给出了本文市政分析所涉及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值。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i2y	1 979	60.25	24.71	10.70	214.8
lchk	1 981	13.75	0.757	11.89	16.69
lcay	1 982	10.25	0.683	7.887	12.44
estructure1	1 981	7.594	7.537	0.060 0	58.62
estructure2	1 981	0.807	0.441	0.094 3	9.482
cunivers_r	1 875	22.60	19.77	0.752	141.8
cown_strctr	1 957	8221	7409	338.8	208 609
tfiscal_r	1 982	14.41	10.06	0.923	234.9
copns	1 826	0.124	0.139	3.20e -05	0.720
lroad2y	1 975	0.990	0.557	-3.039	3.629
lwtp2y	284	0.251	0.606	-1.621	2.797

3 实证结果

3.1 主要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主要回归结果。

表3 主要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VARIABLES	OLS1	OLS2	FE1	FE2	FE_lroad	OLS_lwaterpipe
	ci2y	ci2y	ci2y	ci2y	lroad2y	lwtp2y
lchk	-5.982 *** (0.738)	-3.307 *** (0.833)	-1.778 (4.706)	-2.651 * (1.552)	-0.135 *** (0.039)	-0.175 *** (0.043)
lca		-5.526 *** (1.872)		-3.283 (2.154)	-0.198 * (0.118)	-0.563 *** (0.092)
cstructure1		0.311 ** (0.139)		0.175 (0.212)	0.016 ** (0.007)	0.003 (0.009)
cstructure2		-9.776 *** (1.908)		-11.785 ** (5.004)	-0.085 (0.058)	-0.039 (0.057)
cunivers_r		0.202 *** (0.029)		0.139 *** (0.052)	0.004 *** (0.001)	0.006 *** (0.002)
cown_stretr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tfiscal_r		0.582 *** (0.138)		0.573 ** (0.254)	0.003 ** (0.002)	-0.002 (0.005)
copns		7.053 * (3.963)		-3.649 (7.023)	-0.005 (0.137)	1.192 *** (0.264)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32.588 *** (10.330)	144.552 *** (21.261)	75.107 (64.393)	119.339 *** (29.661)	4.870 *** (1.208)	8.525 *** (1.078)
Adjusted R - sq	0.273	0.273	0.273	0.273	0.273	0.273
Observations	1,980	1,733	1,980	1,733	1,730	243
Number of code1			288	270	270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表3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简单混合 OLS 回归和多元混合 OLS 回归结果。这两列结果表明,城市投资率和城市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局限,可能有大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相关的不可观测因素会影响城市投资率,因此我们利用面板数据的优势进行固定效应回归。第3列和第4列分别报告了与简单 OLS 回归和多元 OLS 回归对应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城市固定效应之后,城市投资率和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仍然显著。从第4列给出的结果看,在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的条件下,城市规模增加一倍,对应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率在边际上将下降5.4个百分点。第5列和第6列分别以单位 GDP 平均的城市道路面积和排水管道长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辅助回归。其中第5列以单位 GDP 平均的城市道路面积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但由于城市排水管道长度我们只能获得2011年的截面数据,无法控制固定效应,因此我们在第6列只报告 OLS 回归结果。这两列结果显示,人口规模更大的城市按照单位 GDP 平均的城市道路面积显著更小,排水管道长度也显著更短。

3.2 分东部和中西部子样本回归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当我们把样本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个子样本之后,回归结果(表4)显示,只有东部地区的城市,其市辖区人口规模的系数才显著为负,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则并不显著。这也就意味着,和中西部地区相比,推动东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有利于在边际上降低投资率。换言之,城市人口规模扩容降低投资率的效应,主要集中在东部而非中西部地区。采用道路面积所做的固定效应辅助回归也印证了这一结论:增加城市人口规模对于节约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平均的道路面积,其边际效果在东部地区要甚于中西部地区。

表 4 东、中、西部城市人口规模与投资率

	(1)	(2)	(3)	(4)	(5)	(6)
VARIABLES	fe_E	fe_M	fe_W	fe_road_E	fe_road_M	fe_road_W
	ci2y	ci2y	ci2y	lroad2y	lroad2y	lroad2y
lehk	-3.701 *	-7.257 *	2.569	-0.178 ***	-0.165 ***	-0.099 *
	(2.051)	(3.705)	(2.280)	(0.050)	(0.062)	(0.051)
lcay	-2.580	-5.444	-6.042	-0.117	-0.481 ***	-0.409 ***
	(2.047)	(6.680)	(4.603)	(0.084)	(0.086)	(0.134)
cstructure1	0.237	0.197	-0.253	0.017 **	0.010	-0.001
	(0.302)	(0.455)	(0.349)	(0.008)	(0.013)	(0.009)
cstructure2	-11.024	-5.818	-14.033 **	-0.083	-0.034	-0.111
	(7.276)	(6.176)	(6.573)	(0.065)	(0.114)	(0.106)
cunivers_r	0.185 **	0.134	0.045	0.006 ***	0.005 ***	0.003
	(0.083)	(0.097)	(0.102)	(0.002)	(0.002)	(0.002)
cown_strctr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tfiscal_r	0.392 *	0.582 *	1.017 ***	0.002 **	0.010 **	0.004
	(0.225)	(0.307)	(0.202)	(0.001)	(0.005)	(0.003)
copns	-12.288	-8.546	64.804 ***	-0.037	0.107	0.560
	(8.589)	(14.012)	(24.025)	(0.162)	(0.223)	(0.672)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29.914 ***	196.644 **	71.079	4.639 ***	7.999 ***	6.545 ***
	(30.115)	(88.857)	(62.426)	(0.966)	(1.361)	(1.459)
Observations	851	530	352	848	530	352
Number of code	132	79	59	132	79	59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4 结论和政策含义

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居高不下的投资率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在多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城市化过程中因为经济活动集聚而带来的报酬递增,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结构变动提供了内生动力。城市发展的规模效应也意味着人口规模更大的城市,其节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效应越明显。限制城市人口规模在微观上不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在宏观上不利于降低投资率,不利于改善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和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因为体制和政策原因而导致的高度本地化的人口迁移和分散的城市化,使得大多数城市人口规模偏小而不能充分发挥城市集聚经济的潜力,其在宏观上的一个后果就是投资率持续居高不下。

本文采用城市面板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其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越高,而城市投资率越低。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子样本回归,发现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对降低投资率的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是显著的,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上述结果在控制一系列变量和城市固定效应之后依然高度显著。这意味着从推动宏观经济层面总需求结构的合理调整出发,有必要改革现行控制城市规模人口的政策取向,尤其应当放松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限制,推动经济活动和人口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实现更有效率的集聚,从而进一步改善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平衡、协调、可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Huang Y, Wang B. Cost Distortions and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China[J].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010, 18(4): 1-17.
- [2] 郑思齐,孙伟增,吴璟等. “以地生财,以财养地”——中国特色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 2014(8): 14-27.

- [3] Modigliani F, Cao S L.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42(1): 145-170.
- [4] 刘生龙,胡鞍钢,郎晓娟. 预期寿命与中国家庭储蓄[J]. *经济研究*,2012(8):107-117.
- [5] 万广华,张茵,牛高建. 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 *经济研究*,2001(11):35-44.
- [6] 杭斌. 习惯形成下的农户缓冲储备行为[J]. *经济研究*,2009(1):96-105.
- [7] 程令国,张晔. 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J]. *经济研究*, 2011(8): 119-132.
- [8] 何立新,封进,佐藤宏. 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08(10):117-130.
- [9] 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 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J]. *经济研究*,2008(2):119-131.
- [10] 高梦滔.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户储蓄:基于8省微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2010(4):122-134.
- [11] 甘犁,刘国恩,马双. 基本医疗保险对促进家庭消费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0(增刊):30-38.
- [12] 白重恩,李宏彬,吴珍斌. 医疗保险与消费: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12(2):41-53.
- [13] 杨汝岱,朱诗娥. 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J]. *经济研究*,2007(12):46-57.
- [14] 陈斌开. 收入分配与中国居民消费——理论和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2012(1):33-49.
- [15] Chen B, Lu M, Zhong N. Hukou and Consumption Heterogeneity: Migrants' Expenditure is Depressed by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in Urban China[EB/OL].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989257.
- [16] 林毅夫,苏剑. 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 *管理世界*,2007(11):5-13.
- [17] 陈彦斌,陈小亮,陈伟泽. 利率管制与总需求结构失衡[J]. *经济研究*,2014(2):18-31.
- [18] 李中. 中国“土地财政”的成因探析与治理对策研究[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87-91.
- [19] 鞠方,林辉叶,周建军. 土地出让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56-60.
- [20] Chen B, Yao Y. The Curse Virtue: Government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ese Provinces [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 73(6): 856-877.
- [21] 吕冰洋,毛捷. 高投资、低消费的财政基础[J]. *经济研究*,2014(5):4-18.
- [22] 朱希伟,陶永亮. 经济集聚与区域协调[C]//朱希伟.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23] 徐现祥,王贤彬,高元骅. 中国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C]//朱希伟.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24] Richardson H. The Costs of Urbanization: A Four Country Comparison[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87(33): 561-580.
- [25] 弗农·亨德森. 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及政策选择[C]//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 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 [26] 李扬,殷剑锋.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2005(2):4-15.
- [27] Gabaix M, Ioannides Y M. The Evolution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s[J]. *Handbook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2004(4): 2341-2378.
- [28] Fujita M, Krugman P R.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4, 83(1): 139-164.
- [29] 张涛,李波. 关于我国城市化相关问题的研究[J]. *比较*,2007(31):20-32.
- [30] Zheng S, Wang R, Glaeser E L, et al. TeGreenness of China: Househol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0,10(6): 1-32.
- [31] 雷潇雨,龚六堂. 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2014(6):44-57.

(责任校对 朱正余)